

# 孫中山現代化綱領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綱要）

## ——從戰略之「道」談起

段培君

中央黨校教授  
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

本文基於戰略之“道”研究和評價孫中山的現代化綱領，從歷史和全球發展兩個維度闡釋戰略之“道”的價值和規律內涵，為探討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提供一種基礎性的看法。

### 一、孫中山現代化綱領的地位與價值點

1、孫中山三民主義綱領的歷史地位需要放在中國現代化綱領的演進中認識。關於中國現代化綱領的演進，作者曾在 1992 年著文認為，中國近代以來較有影響的文化綱領主要可以歸結為“中體西用”、“托古改制”、“自由為體，西學為用”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是一次階段性總結，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比較全面、具體而自成系統的綱領，是經過歷史析化後的一次綜合。它在文化變革的方法論方面，在文化變革從未分化的整體向各子系統的深化方面，在文化涵化與創造方面，都有一些可貴的探索，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思想遺產，對於後來現代化綱領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段培君：《中國近代化綱領的文化學透視》，《學術月刊》1992 年第 2 期。）

2、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是以“民”為主體、為價值落腳點的。他主張“建設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一價值點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通過“以人為本”命題有了新的表述和時代體現。

孫中山這樣說明其思想淵源：“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他引用的古代民本論述有《尚書》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朱熹的“國以民為本”等。孫中山民本思想的近代內涵是，它肯定了民族本位是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走向近代化的必然形式。它一方面是目標，是要振興中華；另一方面它又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倒清、推翻帝制、建立合眾國。把合眾國引入民族主義綱領表明，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一方面內容的全面展開，同時也取得了民族的特有形式。孫中山還把民生問題納入文化綱領，認為實現民生主義是實現民權主義的深化，具有他自身的創造性。

在當代中國大陸，提出“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表明確立了現代化綱領新綜合的邏輯起點。“以人為本”既是某種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又是現實實踐的訴求。“以人為本”在形而上的層面上成為現代化全面建構的價值依據，又改變了中國現

代化的表達結構，同時也使孫中山的民族、民權和民生思想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得到了新的體現。（段培君：“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與兩岸的戰略選擇——兼論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歷史地位”，2006 年香山孫文論壇）

中國的歷史進程表明，作為戰略之“道”的價值點具有特殊的意義。

## 二、當代大戰略理論的新概括與價值點

20 世紀 30 年代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略思維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反映了深刻的時代內涵，帶來了全球面貌的重大變化，具有某種文明轉型的特點，體現了戰略價值點的轉變。

### 1、戰略到大戰略的視野變換

1929 年利德·哈特《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可以視為從傳統戰略視野到大戰略視野變換的開始。大戰略的視野，主要“大”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大”在手段範圍的選擇上，它不僅考慮軍事手段，而且考慮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手段；不僅考慮實施戰略的直接路線，而且更重視間接路線。其次“大”在對目標範圍的選擇上，即不僅考慮戰時目標，而且考慮戰後的目標；不僅考慮軍事目標，而且考慮經濟、政治等目標；不僅考慮某個領域的目標，而且考慮國家的整體目標。第三，“大”在對大目標體系、大手段體系、以及大目標與大手段之間的協調上，是大系統的視野。（段培君：“戰略到大戰略的視野變換”，學習時報，2012 年 6 月 4 日）

### 2、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的重心轉變

從戰略到大戰略的轉變已經內含戰略結構的一些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戰略的重心從軍事戰略轉向發展戰略。戰略的結構形態由原來主要是軍事形態的戰略，演變為包含各個領域發展戰略的大戰略或國家戰略。以工業化、現代化為背景，發展戰略演變成為戰略重點，成為國家戰略結構中的主要部分，成為戰略角逐的基本方面。戰略的直接目標和實施途徑主要是經濟等相關資源的配置，以人與物的關係形式出現，而不是像軍事戰略中以人與人的征服關係為主要形式，戰略的活動規律發生某種變化。（段培君：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的重心轉變，學習時報，2012 年 6 月 18 日）

### 3、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模式轉換

戰略到大戰略視野的變化，以及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重心轉移的變化，引發和伴隨了戰略思維和活動模式的變化。戰略的競爭和博弈依然存在，但博弈的主導模式從零和博弈轉向非零和博弈。在發展的領域，首選的戰略模式是非零和博弈。當代戰略活動越來越重視雙贏乃至多贏的非零和博弈。中國外交提出的和平發展和互利共贏，對台關係中提出的“共創雙贏”的方針，都體現了非零和博弈的特點。雖然在財富、資源、機遇都是有限的某種封閉條件下，零和博弈仍然存在，但是從全球的基本趨勢看，非零和博弈無疑是首選和主導性模式。（段培君：“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模式轉換”，學習

時報，2012年7月16日)

#### 4、他組織到自組織的機制轉變

傳統戰略的實施機制不論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的，都以它組織機制為主。隨著戰略重心從軍事戰略轉向發展戰略，特別是轉向經濟發展戰略，戰略的實施機制由他組織轉向自組織。自組織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不僅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微觀基礎上，而且也體現為自組織機制的宏觀地位發生變化。這是戰略從它組織到自組織的一種組織轉型。二戰以後，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和社會組織機制的變化，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社團革命這樣的戰略新格局。這在人類戰略實踐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轉折的最重要原因是組織機制的變化。(段培君：“它組織到自組織的機制轉變”，《學習時報》，2012年7月30日)

#### 5、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類型演變

隨著戰略重心轉向發展戰略，特別是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發展戰略所依賴的優勢類型發生變化。當代戰略實踐中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變，反映了這種變化的具體內涵。比較優勢在長期的戰略實踐中占主導地位，如田忌賽馬、若米尼的戰略定義、克勞塞維茨論的兵力集中法則、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成本比較優勢、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等。隨著發展進程的深入，波特認為，“比較優勢不足以解釋產業強國的大多數產業現象”，發生了“比較優勢的退位”的情形。競爭優勢應該是一國財富的源泉。(段培君：“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類型演變”，《學習時報》，2012年8月13日)

當代大戰略理論的發展實質體現了一種文明的轉變。其首要之點是價值點的轉變。大戰略的提倡者強調：“戰略僅僅關注如何贏得軍事勝利的問題，而大戰略必須具有更長的視野，因為它的問題是如何贏得和平。”大戰略必須考慮戰後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標，必須考慮人民的生活狀況，因為“勝利的真正含義意味著，在戰爭結束後和平的狀況和人民的生活狀況比戰前要更好一些。”“大戰略不外乎是國家的最高政治戰略，它決定著國家的百年大計。它還必須著眼於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使命”。

可以用“全”和“善”兩個範疇概括大戰略的哲學思想。“全”，是大戰略的大系統視野，要求全面把握大戰略各種手段之間、路徑之間、資源之間的關係，全面把握大戰略各種目標之間、各種手段與目標之間、效果與代價之間的關係。“善”是大戰略的價值評估，涉及大戰略各種手段、各種目標、目標與手段關係、效果和代價的價值評估。大戰略的價值評估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人類生活的根本價值層面，是人類在二次大戰後以大戰略的形式反映出來的對價值的一次重估。這種價值點的變化從全球角度反映了戰略之“道”的新變化。

### 三、戰略之“道”規律內涵的新闡釋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

### 1、“以人為本”的規律論意義

“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不僅是價值論的命題，而且應當視為規律論的命題。“以人為本”作為社會一般價值規律的內涵可以理解為，社會發展是人的價值確立、建構、實踐和實現的客觀進程，該進程的規律性體現為人的價值需求的前提性、人的價值需求的全面性和價值實踐進程的全面化趨勢，人在價值實踐中的主體性，以及人的價值活動和價值實現的歷史性。“以人為本”是一個具有社會發展規律意義的價值命題。（段培君：“以人為本的規律論意義”，學習時報，2008年12月22日）

### 2、羅馬興衰的機制新闡釋

羅馬的它組織機制——權力結構的平衡機制，包含常備軍、以常備軍為基礎的統帥乃至以後的元首、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中央和行省的行政體系這四個部分的相互制約、相對平衡和穩定運行。這是羅馬帝國早期鼎盛的秘密之一。它組織機制是自組織機制發揮作用的保證。

自組織機制是它組織機制運行的經濟基礎和長期生存的微觀基礎，也是整個社會歷史生活的現實基礎。這是羅馬帝國鼎盛的另一個秘密，而且是更重要的秘密。它包含自組織的市場機制、自治型的城市化和自組織的行會制度等。羅馬帝國的衰亡，先是自組織機制的上層結構被破壞和實施環境發生變化，然後破壞自組織機制本身，最終在兩者的互動下導致帝國的覆滅。其中對自組織機制的破壞是基礎性、根本性的破壞。（段培君：“戰略思維理論與方法”，中央黨校省部級“戰略思維與領導能力”班課件，2013年9月12日）

經濟發展的動力或活力，社會發展的動力或活力，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或活力，歸根結底來源於自組織，來源於無數個體的自組織活動。在當代條件下，人類自組織機制所具有的戰略作用有新的內涵。它不僅是它組織機制運行的微觀基礎，而且也成為整個社會戰略實踐的宏觀實施機制。包括中國轉型在內的全球轉型發展趨勢表明了這一點。（段培君：“轉變中國模式”，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結項報告，2013年8月。）

### 3、戰略之“道”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

研究戰略之“道”有助於深度思考歷史和未來。根據該“道”，“以人為本”應體現於機制，通過把握規律實現發展和繁榮。因此，解決自組織[市場、民主（根部）、法治（根部）、自治、社會組織等]和他組織（行政機構、軍隊、司法機構等）的關係和作用機制問題，具有特殊意義。

對於大陸而言，十八大的戰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這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與目標置於同一層次的原因所在。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自治機制、民主與法治機制等自組織機制，如何形成和完善選舉機制、決策機制、選人機制、官員管理機制、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是關鍵所在。必須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

制度體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e7ff90101fvd0.html)

對於臺灣而言，政治家和戰略家不僅要看到戰略之“道”的歷史發展，而且要看到它的全球發展。戰略之“道”的全球體現已經表明，僅僅從一個地域來謀劃自身的發展不可能成功。臺灣不僅需要從全球視野繼續完善自身的發展機制，而且尤其需要跳出島嶼視野進行大戰略籌畫。

筆者在此願意重複 2006 年香山孫文論壇時說過的一段話：“兩岸問題的戰略選擇首先需要兩岸政治家對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的深刻解讀、寬廣視野和高度智慧。任何狹隘、短視或淺薄將無濟於兩岸問題的解決。這也要求兩岸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審時度勢，從全球化的大視野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試圖通過孤立和封閉追求一派之利益，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目標，而且也將失去唾手可得的機遇，在兩岸的博弈中失去民眾的支持而走向失敗。”

### 部分參考文獻：

- 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 2、《孫中山選集》下卷。
- 3、段培君主編：《戰略思維理論和方法》，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 4、段培君著：《中國結構性大戰略》，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 年 1 月。
- 5、段培君：戰略學何以可能，《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3 年第 1 期。
- 6、段培君：《中國近代化綱領的文化學透視》，《學術月刊》1992 年第 2 期。
- 7、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三聯書店，1957 年。
- 8、段培君：《現代化綱領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江蘇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
- 9、段培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發展的新戰略”，《人民日報》理論版，2003 年 8 月 20 日。
- 10、段培君，“中國發展戰略的新模式——科學發展觀的戰略透視”，香港《中國評論》，2004 年，第 5 期。
- 11、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 12、[美]邁克爾 波特：《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 年 1 月。
- 13、B. H. Liddell Hart, *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A Study in Strategy*,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29.
- 14、鄭文翰主編：《軍事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